



黄冬敏

著

理性主义史学研究

——以十八世纪的法国为中心

理性主义史学及其所阐释的政治、伦理、宗教问题是组成西方社会机构、制度的基础的问题，他们或嘲讽、或损益、或臧否，都是一种人类精神自识的表现，他们构筑的理想并不是新的，是继承着古往的理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人类的梦想，这是人类对自身的探寻，或忧虑、或悲伤、或欣喜，吸引着人们向前追寻。

岳麓书社

青年学术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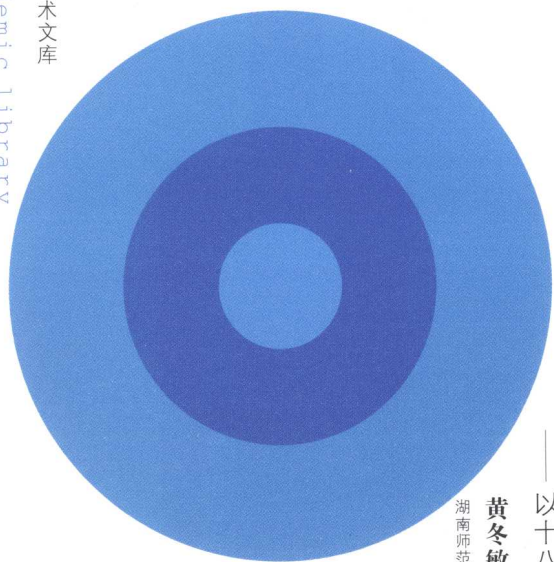
Youth academic library

理性主义史学研究

——以十八世纪的法国为中心

黄冬敏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青年学术文库

Youth academic library

岳麓书社

序：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

五月的上海，花团锦簇，浦江两岸人流涌动。

上海世博会，流光溢彩，举世瞩目。

为了错开人流，栖居申城的我，却闭门读书，那倒是另有一番乐趣和收获的。不信吗？黄冬敏博士的大作《理性主义史学研究——以十八世纪的法国为中心》，硬是把我带进了十八世纪的西欧那个“流光溢彩，举世瞩目”的时代，引领我去浏览理性主义史学，感悟史学思想之真谛，进而去探究“整个人类思想链条上不可分割的一环，它包含着对人性的理解，对自身的追问，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反映与对美好社会的构建”。

细读全书，发觉上引作者之言不虚。岂止如此，这的确是一本值得我们细细看的书，或许可以感受到作者在“后记”中谈及她读书时的“书我两心知”的真情，分享慢慢地阅读，日子静静地流逝所带来的那种淡定，那份闲适……

这种读书时的心境，在我读冬敏这本处女作时，算是略知其中三昧了。

言归正题。通常说来，从18世纪初迄至法国大革命前，史称“启蒙运动时代”。在法文中，启蒙（lumières）就是光明或照亮的意义。用什么去指引人类通向光明大道呢？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那就是理性，理性之光。于是，光明就是理性，就是理性之光，就是用这

种理性之光，开发民智，改造社会，启迪人类，从愚昧走向知性，从野蛮走向光明。

其时，理性主义思潮弥漫于整个西欧大地。在理性主义的旗号下，批判旧世界，建构新世界，举起思想批判的武器，向一切权威宣战，正如恩格斯所言，“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①。新兴阶级及他们的代言人，所要建立的，不过是他们心目中梦寐以求的“理性的王国”。

此情此景，当然无不对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何兆武先生说：“西方历史学由传统步入近代的开闢的大关键，第一幕是文艺复兴运动，第二幕是启蒙运动。”^②此言甚是。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史学生成之关联、理性主义史学之特征、理性主义史学之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这些具体的阐释，自可打开《理性主义史学研究》一书，从中寻求答案。可以说，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西方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所作出的最新的和最出色的研究成果。较之前人，无论在立论、阐述、材料等方面，都要前进了一步。

在这里，个人对理性主义史学的历史意义及其贡献说个大概，以为一般读者阅读这本专业性较强的史学著作“指点门径”。

关于理性主义及其史家，吴于廑先生曾这样言简意赅地指出过：“他们以人的理性为求得真理的准则，人依其理性以认识自然，也依其理性以改革社会，发扬理性，就是推进历史；蒙蔽理性，就是阻塞进步。”^③在我看来，这位前辈历史学家所论，可以对理性主义史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② 何兆武《对历史的反思》，见唐纳德·R·凯利著，陈恒、宋立宏译《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译序，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③ 吴于廑《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载《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最基本特点作一个归纳。总之，追求理性之光，的确是当时理性主义历史学家们的共同愿望。

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理性主义历史学家以锐利的历史批判精神的锋芒，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人类历史的所有活动，尤对中古神学史观和基督教“正统教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这方面，伏尔泰的猛烈批判言尤于耳，不久便听到了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十六两章中所显现的同样锐利无比的历史批判精神的声响。

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理性主义史学具有“世界主义”的视域，意在用开阔的眼光去观察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并把它纳入同一个时空范围内以构建新的世界史体系，尤见于理性主义历史学家对欧洲之外非基督教文明的关注，对东方文明的关注，于是伏尔泰不由发出了“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①的赞叹。

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近代西方史学中的进步史观在启蒙运动时代进一步发展了，理性主义历史学家大多对人类的前途持有乐观主义的态度，笃信人类社会能够不断地完善和进步。百科全书派的“人类必将走向进步”的信念，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十阶段论”，尤可为这一时代的进步史观的进步作证。

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理性主义史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理性主义历史学家们看来，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训的哲学，意在用他们搜集到的材料构建出一般的命题，把历史作为一种工具，以实现其政治目的、道德规劝和伦理说教，换言之，在他们那里，历史变成了一座“政治的和道德的学校”。

这里不妨引作者在“结论”中的一段话，或可对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的意义及地位作个小结：

① 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01页。

理性主义史学是古典、人文主义史学和浪漫主义史学之间的连接点，其史学方法、编撰风格、自身修养和卓越的表现才能，无愧于前贤，不逊于后学，集诙谐、庄重、嘲讽、谦恭、戏谑于一身，构成启蒙时代多彩的色调：或浓重、或素雅，体现了启蒙思想家们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探寻，对文化的企慕，对人生境况的追问，反映了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是人类找寻自我，解答人生与宇宙之迷中的重要一段。

是的，正由于这“重要的”一段，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在人文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在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中，又前进了一大步。俄国诗人普希金这样说过：“伏尔泰第一个走上了新的道路，并把哲学的明灯带进了黑暗的历史档案库中。”^①这一对伏尔泰的“赞颂”，也可用在伏尔泰之外其他的理性主义历史学家们。

诚然，理性主义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那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之使然，而不必苛求于前人。但毋庸置疑的是，正由于18世纪理性主义历史学家们的努力，才为19世纪西方史学的“腾飞”创造了条件。

至于说到本书作者黄冬敏，我作为她的老师，见证了她在复旦攻读三年的人生之旅。如今，当我重新回眸她的这段人生经历时，不由深深地感叹：她为学之艰辛，为学之不易。

“我喜欢这里，我想进来。”这是冬敏一直有的“复旦梦”。后梦想终于成真，她用欢快而轻松的笔调写道：“真的，在复旦百年校庆的日子里，我来了。”

百年校庆的光华，随风而逝，这位初进复旦的学子，接下来的学习任务并不轻松，她感到：要学的理论如此深奥，要看的书又是那么多，像一座座小山压在她身上，喘不过气来。不过，她硬是以自己的“倔劲”艰难地挺了过来，闯过了一道道“关卡”，最终完成了博士

① 转引自维·彼·沃尔金著《18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4页。

学业。我在为她的师兄褚新国博士论文出版作序时曾说过：“可以这样说，艰辛锻炼了他，也造就了他；复旦艰辛的求学之路，更留下了他自己所说的‘复旦生涯’。”^① 这里的话，也同样适用于她。一个出身“寒门”的学子，终于靠自尊、自强，不怕困难，不畏艰险，以从不服输的精神一往无前，她坚信，走过去，前面就是一片蓝天。

冬敏给我印象很深的另一点是她毕业时的择业志向。与一般学生留恋大上海的择业去向不同，她同她的师姐易兰一样要去内地，回应母校的召唤，因为在那里更需要她，也因为在那里，她留下了更多的个人记忆：有橘子洲头的足印，还有那爱晚亭的情影。我在此遥祝，愿这颗“复旦的种子”在岳麓山下生根、开花，茁壮成长在“芙蓉国”里。

“学无止境，唯恒心以待。”这是黄冬敏自己的话语，我借此以自勉，同时也赠给我们的年轻学子们。

是为序。

张广智

2010年5月1日，上海世博会开园之时，
于复旦大学书馨公寓。

^① 见张广智《塔西佗史学和他的历史学家地位》（代序言），载自褚新国《帝国的沉沦与救赎——塔西佗和他的历史世界》，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目录

导 言	一、国外研究概况	004
	二、国内研究概况	016
第 一 章	理性主义与欧洲启蒙运动	020
	第一节 理性主义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想	022
	第二节 启蒙思想的传播与社会化	037
	第三节 理性主义史学	044
第 二 章	理性主义史学的历史思想	054
	第一节 理性主义史学的社会史观	054
	第二节 理性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观	066
	第三节 理性主义史学的进步史观	082
第 三 章	理性主义史学与宗教	090
	第一节 理性与天启的颀颀	090
	第二节 理性的宗教主张	107
第 四 章	理性主义史学与启蒙方案	130
	第一节 伦理—政治史观	130

	第二节 文雅社会的建构	140
第五章	理性主义史学的史学理论	147
	第一节 理性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	147
	第二节 历史因果与历史解释	163
	第三节 理性主义史学的写作特点	167
	结 语	176
	一、理性主义史学的意义	177
	二、薪尽火传——西方人文传统的赓继	182
	参考文献	186
	后 记	197

导 言

早在古希腊神话中，人们就将“历史”赋予了文艺九女神之一——克丽奥。但史学真正体系化，是在历史成为一门科学，出现职业的历史学家才发展起来的。在19世纪被称之为“历史的世纪”里，史学及其理论极大发展起来。而18世纪，一些有影响的历史著作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所写，如撰写《路易十四时代》与《风俗论》的伏尔泰、撰写《罗马盛衰原因论》与《论法的精神》的孟德斯鸠、撰写《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卢梭等。英国的洛克与休谟以政治家与哲学家声闻当代。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等人是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立者被后人景仰的。因而，启蒙时代的史学可以说是一种过渡，一种连接古代与近现代史学发展脉搏的桥梁，探究这一时期的史学有助于理解历史意识的发展演变过程，更好地认识西方史学自身发展进程的特点及发展脉络。

启蒙时代的史学铭刻了深刻的时代印记，即理性主义思潮引发下的欧洲启蒙运动，在启蒙时代的星空上，可谓群星璀璨，光耀千古。杰出的思想家们从各个角度阐发启蒙思想，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它使得人们意识到生命的壮伟、人生的意义和个体的尊严与价值，使人们昂然屹立于天地之间，成为人自身的主宰。启蒙时代历史写作的特点是将自然哲学与新的社会哲学结合起来应用于历史写作，从而促成理性主义史学学派或谓之启蒙史家群

体的出现。^① 伏尔泰被认为是“理性主义历史学派的奠基者”^②。理性主义史学的核心是理性的运用，启蒙思想家认为通过理性的运用，人类能够理解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信理性能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因而理性探寻成为理解社会与改善人类境况的关键。这种理性是根植于经验观察和数理分析基础之上的。法的精神，即人类精神在历史进程中的体现成为首要考察的对象。在历史进程中，上帝被悬置，神圣的普世史观受到世俗化的哲学的历史观的挑战。启蒙思想家对理性和自身力量的肯定，使他们相信人类生活能够得到改善，朝向正义、人性与幸福的社会秩序迈进，体现在其历史著作中既有对社会的批判，又有各种关于社会构想的阐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在西方史学发展长河中，经历过五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③，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史学处于第三次转折进程中，上承人文主义史学，下启浪漫主义史学，在继承西方优秀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将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促进了历史学世俗化和历史领域的拓展。“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史家把西方历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近代史学的体系日渐成熟，这就标志着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最终确立。”^④ 启蒙思想存在着多样性和内在的差异，反映在史学上亦然。理性主义史学是启蒙时代，尤其是在法国成为史学主流，与此同时，还有其他承继以往的史学类型。^⑤ 启蒙思想家运用理性研究历史，既有共性，也与各自国家具体相关，既蕴涵浪漫主义先声，又承启后世民族史学之路，

① Harry Elmer Barnes,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3, p. 149.

② Harry Elmer Barnes,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3, p. 152.

③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37页。

④ 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

⑤ 汪荣祖《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7页。汪先生认为法国史学在17、18世纪，已有三大宗派：人文学派、博学派和哲学派。

同时包含对人类社会的关切，将人文之思及社会构想融入现代。

厄奈斯特·巴克认为人的本质在旅途，“我们所研究的东西既属于昨天，也属于今天，因为它在本质上是永恒的”^①。柯林武德也指出，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既然没有谁尝试之前就知道他能做什么，所以人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就是人已经做过什么”^②。启蒙时代的史学是整个启蒙时代理性思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整个人类思想链条上不可分割的一环，它包含着对人性的理解，对自身的追问，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反映与对美好社会的构建。在辩难、反思、批判中体现了人们对人生、社会的体察与感悟，是启蒙时代的人们留给后人的宝贵思想财富，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既丰富了史学领域的研究，又启发当下人们对自身的探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启蒙运动是西方近代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是西方近代继文艺复兴以来又一场深刻的思想运动，在17世纪末起源自英国，以后在欧洲各主要国家兴起。从启蒙运动整体发展状况来看，启蒙思想家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法国，而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撰写的历史著作体现了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总体特点，故而本书对18世纪欧洲理性主义史学的研究是以法国为中心，兼及同时期英国、德国等重要思想家的历史著作。理性主义史学蕴涵的深度、涉及的广度都非笔者能力所及，受其人文之思的吸引，笔者不揣浅陋，力图对这一史学的渊源进行梳理，勾勒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的面貌。本人的研究是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有关国内外关于理性主义史学的研究概述如下：

-
- ① [英] 厄奈斯特·巴克著，卢华萍译《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 ② [英] 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8页。

一、国外研究概况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在近代西方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研究视阈几乎广及启蒙时代各个领域,关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史学研究进展也较大。笔者认为国外学界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在史学史或在思想史的脉络中介绍,并对其作出整体概括的分析和评价。

关于史学史的研究,在 19 世纪中叶受到重视,20 世纪初叶陆续出版了一批史学史专著,如佛特的《近代史学史》(1911 年)、古奇的《19 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1913 年)、里特尔的《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 年)、J. T. 勾特威尔的《史学史》和 J. W. 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1942 年)等。古奇研究 18 世纪史学时,综述了之前的史学概况,对 18 世纪史学从学识积累、史料批判、研究对象和范围、历史哲学四个方面作出了肯定的评价,但也指出理性主义史学存在的局限性^①;汤普森对理性主义学派进行了总览概括式的介绍,对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历史研究情况加以解说,其特点是对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吉本等人进行评论,强调他们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叙事风格,注重他们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②

此外,对启蒙时代史学介绍与评价的,还有巴恩斯的《历史著

① [英] 乔治·皮博迪·古奇著,耿淡如译《19 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75~91 页。

② [美] J. W. 汤普森著,孙秉莹、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第三分册),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78~129 页。

作史》(1963年)、布洛塞赫的《古代、近现代史学》(1965年)、叶·阿·科斯敏斯基的《中世纪史学史》及米歇尔·班特雷的《史学指南》(2002年)。

除了一般介绍外,还有学者们对启蒙时代的史学进行了深入分析,如克罗齐、柯林武德、B. A. 哈多克等对启蒙时代的史学都进行了评价与反思,克罗齐探讨了启蒙史学的宗教观、发展观,比较了启蒙时代与文艺复兴时代,他认为启蒙运动大大增加了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但也指出其极端性。班特雷在论及启蒙新意识时指出,“道德训诫‘通过例子的哲学之思’并不是起源于18世纪,在古典作家那里已经出现,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家重新发现了它”^①,并对维科的贡献给予了积极评价,但也指出其影响的有限性。此外,就反启蒙这个议题,班特雷也作了细致的考察,着重点在德国。

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详尽考察了历史学的发生及其发展阶段。论及启蒙史学,认为启蒙思想家在其著作表面之下含有一种历史过程的概念,非理性隐藏在理性之中。海登·怀特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思考了历史编纂作为一种书面话语的地位,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状况,研究了启蒙时代的历史编纂,总结了启蒙运动的史学成就,还探讨了德国史学与启蒙运动的关系等问题。

对启蒙时代思想的研究,也有利于了解与探析其史学。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布林顿在20世纪中叶撰写的《西方近代思想史》,目的在于显示西方思想的多样性在近代是如何发展的,在论述18世纪的思想时认为,启蒙思潮基本观念的特点在于形成了一种新宇宙观以及在这种宇宙观下形成的进步信念。拉斯基在20世纪上半叶所著的《思想的阐释》描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及其内在结构,研究了包括洛克、伏尔泰等在内的启蒙先锋的思想成就,有益于从整体上

^① Michael Bentley, *Modern Historiography: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1999, p. 4.

认识西方思想观念的生成背景及其结果影响。英国的 I. 柏林在《启蒙的时代——18 世纪哲学家》中简略介绍了洛克、伏尔泰、贝克莱、休谟、孔狄亚克、拉·美特利等人的思想。卡尔·贝克尔的《18 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进一步探究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此外，还有 E. 卡西勒的《启蒙哲学》，它是西方哲学史家撰写的关于启蒙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也是享有盛誉的哲学史名著。1932 年德文版出版后，先后被译为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法文等多国语言。卡西勒对启蒙时代的精神及其启蒙思想家所涉足的几乎一切知识领域，都作了生动的描绘，试图理清导致启蒙哲学兴起与规定其演变道路的思想线索，阐明传统哲学概念的改造。他视野开阔，考察了法国、英国、瑞士、德国的启蒙运动，其中第六章对历史领域的征服，对史学研究多有助益。他肯定培尔历史批判的重大价值，指出伏尔泰对文化史的开创，对卢梭的思想也予以了客观评价，对进一步探究启蒙思想提供了借鉴。

其二，对理性主义史学的重要观念进行研究，其中，进步史观、普遍史观、文化史或文明史、历史哲学是关注重点。

彼得·盖伊研究了启蒙时代关于人性的问题，约翰·赫尔曼·兰德尔注目于自然主义与历史理论的相互关系，彼得·麦克拉夫林等则对启蒙时代的进步观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①

在研究进步史观时，一些研究论者将启蒙思想家们在历史著作中体现的进步的观念与基督教末世论或千禧年论联系起来，如格鲁内尔就启蒙思想家们的“可臻完善论”的观点，对孔多塞和杜尔哥进行了研究，认为孔多塞也相信理性的狡狴，认为邪恶本身也推动进步，

① Peter Gay, *The Party of Humanity: Essays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W. W. Norton, 1971; John Herman Randall, *Nature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Essays in Naturalism and in the Theory of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Arnold Burgen, Peter McLaughlin, ed., *The Idea of Progress*, W. de Gruyter, 1997.

指出孔多塞的理性主义也属于非批判的,“孔多塞对狂热主义的抨击本身就会变成狂热主义,他对宽容的论证容易成为不宽容,不道德的手段对他来说似乎对促进道德而言是合乎道德要求的,比如,为了颠覆传统权威,他竭力推崇不诚实和弄虚作假”^①。洛维特和贝克尔都论证了启蒙思想家们关于进步的观念是与基督教神学密切相关的^②。

就启蒙思想家们的进步史观的研究,各自有所侧重,以伏尔泰为例,笔者认为有几个方面:(1)概括介绍,如汤普森、巴恩斯、米歇尔·班特雷等学者从宏观方面所作的介绍;^③(2)涵盖在文明史、整体史的观点中,如布茹米费特和奥布赖恩对伏尔泰的整体史观的研究;^④(3)个别观点的争辩,如对启蒙史学“反历史”的讨论^⑤,克罗齐、柯林武德的指责,卡西勒、彼得·盖伊的反驳等。这些论见都展示了伏尔泰进步史观的某些方面;(4)进步史观专论,除对伏尔

-
- ① [英] 格鲁内尔著,隗仁莲译《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59页。
- ② [德] 卡尔·洛维特著,李秋零、田薇译《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美] 卡尔·贝克尔著,何兆武译《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 ③ 参看 J. W. Thompson,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2; Harry Elmer Barnes,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3; Michael Bentley, ed., *Companion to Historiography*, Routledge, 1997.
- ④ J. H. Brumfitt, *Voltaire Histori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Karen O'Brien, *Narratives of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Gibb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⑤ 班特雷将伏尔泰与博絮埃的观点进行了对比,表明当时人们关于中世纪的一般看法,“对1681年博絮埃在其著当中显露的鄙夷,伏尔泰在1756年发表的《风俗论》对这种鄙夷作出了回应,试图描绘出一种颇具雄心的世界史全景。在其地理范围所及的领域里展现出来的新颖远远超过当时仅以编年叙事的范围。然而,从大多数情况来看,由于人们认为中世纪是粗俗无知的,因而在启蒙运动时代,这样一段令人不悦的历史被疏远忘怀,这意味着巴黎从未遭遇过中世纪”。针对这一看法,班特雷着力探讨了赫尔德、梅内克、兰克、尼采、斯宾格勒等人对待过去的观念。参看 Michael Bentley, *Modern Historiography: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1999, p. 9, p. 22-23.

泰研究以外，学者们对杜尔阁和孔多塞的思想也有深入研究。^①

笔者认为伏尔泰的进步史观既反映启蒙史学的总体特征，也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因此应该对其进步史观进行全面的 research，并且还需加大对其他启蒙思想家的研究力度，以从整体上把握启蒙时代理性主义史学所体现的进步史观。关于启蒙思想家们的世界史观和其他观点，研究者在提及启蒙时代的史学概况时都有论及，此不赘述。

其三，对启蒙时代思想家的史学进行个案研究。

笔者力图从启蒙时代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们的思想中找出其共性，以对启蒙时代理性主义史学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故而在资料收集上对有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有所偏重，主要选择与论文有关的启蒙思想家，因而在述及这方面的史学研究状况中也着意详加阐释。笔者囿于学识和论旨所限，没有论及 18 世纪其他学者，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重要性有丝毫减损。关于启蒙时代史学的个案研究情况，具体言之，主要有以下研究成果：

克伦·奥布赖恩（Karen O'Brien）细致研究了启蒙时代的史学，探讨了普遍主义与历史叙述的关系。她通过对伏尔泰主要历史著作的分析，认为这些著作代表了他关于对历史叙述的文学的、认识论的和主题可能性的一种持续的和宽泛的解释，“作为文学著作，他们确立了一种新的形式和风格，超出并代替了为目的和表达的旧的修辞学理论。作为重述过去的认识论问题的准历史化的研究，它们对同时代法国哲学辩论贡献颇多”^②。奥布赖恩认为伏尔泰史学主旨是以进化和个体的存在为中心，以共同的欧洲文明来吸引国际读者，他显示了这

① 参看 Robert Nisbet, *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Basic Books, Inc., 1980; [英] 约翰·伯瑞著，范祥涛译《进步的观念》，上海三联书店 2005 年版；[英] 乔治·皮博迪·古奇著，耿淡如译《19 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② Karen O'Brien. *Narratives of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Gibb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2.